

马克思诞辰 200 年

# 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

## ——他的时代和我们的世界

张双利

以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根本断定为基础,我们可进一步去思考马克思思想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但要把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中国关联起来,它至少还要包括另外两个方向上的思考: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

2018年正值马克思200年诞辰,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全世界范围内各类纪念马克思的活动如火如荼。不仅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借用德国卢森堡基金会主要负责人马布朗(Michael Brie)教授的话说,这实在是近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之所以会有如此独特的现象,是因为自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直在蔓延和深化。面对着资本主义危机在经济领域的持续和在政治、文化领域的深化,人们开始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借助对马克思著作的重新阅读和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思考,人们希望能够认清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多重内涵,并能进一步探求回应和解决危机的现实道路。换言之,在这一独特现象的背后是人们的急切追问: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内在关联?

### 马克思与他的时代

要求解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至少得经过两个步骤上的思考:首先是马克思与他的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其次是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以及它与我们这个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于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明确指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黑格尔直接驳斥当时盛行于思想界的主观主义态度,强调哲学绝不是从主观的观念或想象出发,而是对其所处时代的根本原则及其具体内涵的概念重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黑格尔最卓越的学生。早在1843年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他就明确指出哲学的使命不在于仅仅批判错误的抽象观念或宗教意识,更在于把握这个产生了这些错误意识的现实世界。据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与黑格尔高度一致,都认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城市特里尔,并在这里度过了17年的时光。200年过去了,马克思已成为特里尔的一张名片。



在马克思诞辰200年之际,由中国赠送的马克思雕像揭幕仪式在他的故乡举行。资料图片

为哲学是在概念高度上对其时代的思想把握。

马克思虽然秉承着黑格尔的哲学精神,但却在对现代世界的根本判断上与黑格尔相互差别。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现代世界给出了三重根本性的断定。首先,由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现代世界不仅有以理性为根据的现代国家,更有以个体自由劳动和个体之间的普遍交换为具体内容的市民社会。甚至可以说,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的最大成就。从其内在结构来看,现代世界由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三个行动领域构成。其次,市民社会并非像亚

当·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美好,它虽然一方面使每个人都认作自足的个体,另一方面又借助劳动分工体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他人普遍相连,但它无法支撑起我们的共同体生活。仅凭自身的逻辑,市民社会不仅会带来巨大的财富,更会带来极致的贫富分化,制造出大量对这个有钱有教养的社会充满仇恨的“贱民”。也就是说,市民社会可使我们的伦理生活被彻底毁坏。最后,现代世界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可以使以理性自由为原则的现代伦理生活得到实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国

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结构性关系。现代国家作为前提和根据,一方面使市民社会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又作为统摄和引领着市民社会的目的,对市民社会的发展进行干预和限定。在这一结构性关系的支撑之下,市民社会中的那些成就共同体生活的伦理机制(如等级、同业公会)得到守护,市民社会中的市民们可凭借着这些伦理机制展开教养的过程。他们从自己的主观意志出发,逐渐认同在国家中所展开的共同体生活为最高目的。经由如此的教养,市民上升为国家的公民。

从1843年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在对时代的根本判断上就与黑格尔相互差别。概要地说,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根本性判断主要包括五个层次。

第一,关于现代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马克思断定现代国家注定衰落,即它无法长期守住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目的性地位。通过考察北美社会中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之所以暂时被人们认作是以普遍理性为根据的国家,不是因为市民社会中有各种伦理机制,而是在市民社会中有被培育出来的抽象宗教精神。人们正是在抽象宗教精神的支撑之下认同现代国家是超越的和普遍的。马克思同时还指出,现代国家由于把市民社会中个体的权利当作是更高的人权,它必然会带来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必然导致货币拜物教的盛行和抽象宗教的衰落。作为这一世俗化过程的必然结果,现代国家注定衰落,它终将沦为市民社会内部的一个环节。

第二,关于市民社会本身的内部结构,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中存在着人对人的权力支配关系。黑格尔已经指出,人们在市民社会中展开的劳动分工和普遍交换关系并不能直接成就美好的共同体,相反它会导致极致的贫富分化和伦理生活的毁坏。马克思对导致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做了更加深入的

揭示。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既有私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相互分离和普遍交换的关系,又有垄断着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与彻底失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前者是横向的,它导致所有人都受“物”的统治,即,人们受由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外部力量的统治。后者是纵向的,它导致雇佣工人受资本家的支配,即,工人的劳动不是他(她)自己的,而是由资本家所强制规定的。正是由于这双重统治结构的共同作用,市民社会同时导致了普遍的自我异化和极致的贫富分化。

第三,关于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现代国家是以市民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要紧的不是简单地把具有普遍形式的现代国家还原为市民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而是说明市民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如何能够在现代世界中被人们普遍接受。换言之,马克思的论述重点在于说明资产者们如何能够凭靠其在市民社会中的支配地位进一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关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内部结构,马克思指出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市民社会中资产者对工

(下转3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